

编者按：1990年农历8月12日(公历9月30日)是我国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四川省动物学会前身成都市动物学会的主要奠基人刘承钊教授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日。本刊特发表刘老照片一组，并选刊华西校友会生物系支会撰写的纪念文章“怀念敬爱的刘承钊老师”及转载刘承钊教授长子刘益康撰写的“雁窝塘畔的追忆”一文，以对刘老表示诚挚的崇敬与永恒的怀念。

怀念敬爱的刘承钊老师

华西大学校友会生物系支会（许大治 执笔）

今年9月30日是刘承钊老师诞辰90周年纪念日。我们追念敬爱的刘承钊老师，回顾他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毕生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创建了中国两栖类动物研究事业，形成以他为首的中国两栖类动物研究中心，对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分类区系的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为人正直，吃苦耐劳，平易近人，关心学生教职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在纪念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要学习他的高尚品质，以激励我们，作好工作，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刘承钊老师1900年农历8月12日生于山东省泰安县长沟镇，在他中学时代，正是反动军阀官僚进行血腥统治，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国势衰败民不聊生的悲惨岁月，因而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1922年他考入北京汇文大学预科，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1925年转入生物系，1927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经系主任胡经甫选任为助教，并同时读研究生。1929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受聘东北大学生物系担任讲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刘老师毅然回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担任讲师之职，1932年刘老师以研究两栖动物的优异成绩获奖学金，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学习，专攻高等动物学，1934年获得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同时获得科学和教育两项“金钥匙”奖，1934年8月他怀着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贡献的热烈愿望返回祖国，获当时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职称，同年在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一面教学，一面进行两栖类动物的研究，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进攻和侵略中国，东吴大学先由苏州市迁至浙江吴兴县，后来日军登陆金山卫，逼近吴兴，在这紧急时刻，刘承钊老师得到学校当局的同意，率领生物系部份师生于1937年11月中旬离开吴兴，经芜湖、汉口、重庆于1938年3月到达成都，1938年春季东吴大学生物系师生转入华西协合大学任教及学习，1938年至1949年刘老师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期间，由于他的学识丰富、教学认真和他在科研方面的探索精神，深受广大师生的敬重和爱戴，1949年成都解放后，他受母校燕京大学的邀请，于1950年至1951年担任燕京大学生物系系主任，1951年人民政府接受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广大师生的建议，任命刘老师担任人民政府接管后的华西大学校长，1953年院系调整后，刘老师继续担任院长职务。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将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还被推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承钊老师教书育人，学生对他的印象很深，1934年至1937年他在东吴大学任教时间，曾开设脊椎动物学，他的学生殷恭毅(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回忆说：“刘老师学风严谨，教学认真，经常考问，促进了学生认真学习，在假期他常组织学生野外活动，采集生物标本，丰富了学生的知识。”1938年来到成都华西大学后，他所开设的课程，当时在华西坝上的五大学学生也喜欢选读。他除教学外，还指导毕业班学生写毕业论文，1942年毕业的生物系学生朱玲美(华西医大教授)的毕业论文即是由刘老师指导写成。40年代刘老师为生物系和医科学生所开设的比较解剖学，是一门基础课程，学生较多，学生赵尔宓(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回忆说：“刘老师上课总是提前几分钟到课堂，从不迟到，上课后就把两侧门关上，迟到学生不敢推门进来，即使进来也感到惭愧，因此学生都提前进教室。”在上课一小时的过程中，他将准备好的教材整齐地写在黑板上，既书写又讲解，使学生条理清楚的记下来，下午实验课虽有李之珣讲师等老师指导，他也要亲自过问和帮助。学生许大治回忆说：“在学完无脊椎动物学和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后，记得1948年一段时间，刘老师组织生物系同学作进化论的专题讨论报告会，每一个学生讲一

个题目，如物种原始、遗传、变异、生物适应、分类学、解剖学，从各方面说明生物的进化过程，这一专题报告会超过了选修一门课程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知识。”1949年成都解放后，1950年在他将要赴燕京大学任职前，还抽出时间为生物系学生讲授胚胎学，并亲自指导实验，这些往事，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刘承钊老师刻苦的科研探索精神，令人敬佩。在他教学的同时，他把很大一部份精力用在科研工作上，1927年至1931年在他担任燕京大学助教和讲师期间，他就与李汝祺教授、博爱理教授共同研究两栖类动物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34年至1937年在他担任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时，他继续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1938年他来到华西大学后，从1938年至1948年间，他多次利用假期去野外采集标本，积累资料，1938年他与东吴大学生物系师生去峨眉山采集标本。这一年他就采集到了弹琴蛙和胡子蛙，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王宜生工程师回忆说：“1939年我到华西大学生物系任职后，常常随同刘老师去野外采集标本，1939年同刘老师至宝兴县采集标本，为了得到科研第一手资料，刘老师不怕苦不怕累不怕任何困难，同行的有他的学生、同事、工友，但他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旧社会交通不便，山区路更难行，吃住困难，生活十分艰苦，路上要遇上强盗，还要遭受风吹雨打，要经受疾病的折磨与考验，当时乘木炭汽车要坐整整一天，从乐山到西昌汽车要开整整一周时间，到山区采集标本全靠步行，每人头戴草帽，足穿草鞋，腿部打上绑腿，手里拿一个采集网，腰上缠一些小布袋，以便装标本。从雅安到宝兴无公路，全靠步行，从宝兴至土巴沟一段还要通过栈道，在住点的地方定下后，早饭后出去，跑山路、涉水沟、钻树丛，下午四、五点钟才能回住地，因此出发前要带点麦粩或炒胡豆等干粮，中午饿了喝点凉水吃点干粮充饥，回到住地后再吃一些食物。采集标本要记录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记录水温、气温，详细绘制标本的彩色图，这些工作有是在采集前和回住地以后进行，刘老师利用大家注射标本处理标本时，则描述标本的生态环境、标本特征，为了保护好标本，在回住地的路上刘老师不断打招呼说，有水的地方要用水浸浸口袋，以免标本回到住地前干死。回到住地，稍事休息，即开始工作，对于这些标本和图纸，刘老师十分爱惜，为了保存好图纸，刘老师特别做了一个小铁箱来装，行路时由我背在身上。在经过比较大的地方，就住茶馆，利用他们关门时，把茶桌拼起来做床睡。1939年在宝兴山区采集标本时，路过巴斯沟，山腰只有一户农民，仅父子二人，房屋只有七至八平方米，房屋是玉米杆和麦草杆盖的，七至八人加上他们父子二人共十余人，就住在这间小屋里过夜，我和另一同事半身睡在棺木(寿木)上，半身睡在地上，衣服淋湿不便烘烤，于是大家把足伸向有热气的柴火棚，就这样和衣睡了一夜。一次从宝兴、天全、芦山回雅安，路过大岩腔(土匪经常出现的)地方，在一个破烂的土地庙前坐着七至八个人手提短枪快枪，走近后，其中一人问我们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张孝威先生把口袋里的蛇拿了出来，他们看后又见一行人的打扮，才走开了。1942年刘老师和王宜生、郭友文等生物系教职工去西昌昭觉一带采集标本，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因而少数民族对汉族有仇恨，在大小凉山常有抓到汉人作奴隶娃子的事情，因此一早一晚不能随便行动，开展科研工作采集标本极为困难，这一年刘老师在昭觉县得了斑疹伤寒病。当时用滑竿把他抬到西昌，在一个庙子住地，经过那里卫生院的医生治疗，吃了一些磺胺药物，过了十余日才脱离险境，这是刘老师的一次生命的考验，四川大学生物系技师吴大均回忆说：“1939年我到华西大学生物系生物材料处工作时，年龄只有13岁，所以开始没有出去采集标本，以后年龄稍大，才随同刘老师去野外采集标本，多次到峨眉山、灌县、彭县以及云南西双版纳等地采集标本，刘老师精力充沛，能够吃苦耐劳，总是和大家一起吃和住。解放前，一次去彭县大耳巴沟采集标本，那里荒山野林，没有人烟，住的是当地农民搭的临时熬碱的草蓬，蓬内堆些树枝和枯草当床睡，吃的是火烧玉米馍，吃前要把馍上的柴草灰吹拍掉，刘老师风趣地说这叫‘三吹三打’，另外找些野菜(羊齿植物幼苗)熬汤，刘老师到西康省的草原上(现甘孜州)采集标本，则与藏胞同吃住，吃的酥油糌粑，喝的是老叶茶，住的是帐篷，在山区采集标本，全靠步行，还要携带生活和工作用品，山区道路崎岖狭窄，到处都是山和河谷，为了过河，要经过竹索桥、独木桥、溜索桥等，稍一不慎，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在森林中，时常受到各种动物的袭击，除毒蛇猛兽外，还有蚊虫、旱蚂蝗、草虱子等。虽然野外采集标本这样艰苦，但刘老师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他不怕这些艰苦，辛勤地工作着。”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吴贵夫高级实验师回忆说：“解放后50年代我在四川医学院生物教研组工作，1959年曾随同刘老师去

贵州威宁县采集标本，刘老师见到动物标本不顾山水寒冷连鞋带袜下水前去追捉，汽车驾驶员受感动，自动下水帮助。1963年刘老师去宝兴采集标本，当时已经63岁，他和驾驶员炊事员住在森林中伐木工人留下的草蓬里，1965年他利用去攀枝花看望四川医学院工作人员的时候，回来时沿西昌、石棉、冕宁一带采集标本，以他这样大的年龄和他的职务和地位，本可以得到一些照顾，但他都婉言谢绝。”1973年刘老师已经73岁高龄，他又一次率领四川医学院生物教研组的李之珣、田婉淑、陈树荣等教职工去宝兴县采集标本，为纪念这次采集，他写下了如下的诗句‘踏遍青山人未老，愿为祖国献余年，七三好似三九壮，采得湍蛙著新篇，五龙溪畔听蛙喧，夹金山麓捉角蟾，回首远看云压顶，低头近见水冲天’。刘承钊老师相同事曾经先后到过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河北、山东、江苏、甘肃、青海等省区进行考察和采集标本。是什么思想支配着他作如此艰辛的科研工作呢？正如他自己所说：“某项科学只要在实践中建立了认识，并且判定他对人民有用，我就要为之斗终身。”他又说：“中国科学家有责任用中国人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开拓出自己的科学领域。”因而他工作时一丝不苟，严格认真，身上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

刘承钊老师一生的辛劳，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一生共发表了60多篇论文和著作，其中一些是他单独研究发表的，另一些是与其他人共同研究发表的，1950年出版了他在旧中国时代所撰写的《华西两栖类》一书，1961年出版了他与胡淑琴合作写成的《中国无尾两栖类》一书，这本书获得了1987年中国自然科学二等奖，同时这本书也为编写《中国动物志·两栖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在纪念刘承钊老师诞生9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的高尚品质，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刘承钊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们心中，他在科研和教学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雁窝塘畔的追忆

刘益康*

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父亲讲他在野外采集的故事。讲采集故事、也是父亲最喜欢的话题。那些充满探索、冒险的经历；那些四川西部充满神秘色彩的风土人情；那一张张泛黄的反映过去时代的照片，曾激起过我无数的遐想，在我脑海中留下父亲的形象是：他是一位为寻觅真知不畏艰险的探险家。

长大以后，我成了一名地质工作者，终于有机会去亲身体会父亲所走过的路了。

有一次，我从昭觉去西昌。西出昭觉城，过了四开，沿公路盘旋上升，到了解放沟。这里完全是彝族聚居的地区。过了解放沟，公路渐隐没在一片迷茫的云雾之中。突然，我们的汽车坏了，司机在修车，看来一时还难以修复。我便信步向前走去，浓雾迎面扑来，寒气逼人，过了一会儿雾渐渐散开，只见前方有一个木牌，走近一看，上面写着“雁窝塘”。原来，就在这里留有父亲坚实的足迹和他的故事……。我环顾四周，在木牌的旁侧有一条潺潺流水的小溪，蹲下来一看，溪中的石隙间，有几只父亲心爱的硕大蝌蚪正在这刺骨的冷溪中悠然自得地嬉游。我凝神地看着它们，此情此景，使我在茫茫的白雾中，不由得追忆起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还有那些泛黄的照片也都映入了眼帘……。

1942年5月上旬，一位来自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教授和他的两位同事踏进了这莽莽灌木丛生、荒草齐腰、海拔3200米空气稀薄的雁窝塘。在那时，这里是没有公路的，从西昌走到这大凉山的腹地雁窝塘，父亲是靠着那穿着草鞋的双脚走了三天才到这里的。他肩上扛着一个须臾不离的采集网，背着一个背包，腰间系挂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布口袋，腿上裹着绑腿，脚上穿着厚布袜和草鞋，一身褪了包的衣裤不少地方还

*本文作者刘益康系刘承钊教授的长子。现任冶金工业部西南地质勘查局副局长，总工程师；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中国金属学会理事；中国冶金地质学会理事；四川省地质学会理事长。

本文转载自赵尔宓主编《从水到陆——刘承钊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